

美学

MEIXUE QIANYAN

前

沿

蒲震元 杜寒风 ⊙ 主编



美学

MEIXUE QIANYAN

蒲震元 杜寒风 ⊙ 主编



沿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学前沿/蒲震元 杜寒风主编 . -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

ISBN 7 - 81085 - 017 - 2

I . 美… II . ①蒲… ②杜… III . 美学 - 文集 IV . B8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423 号

美学前沿

主 编：蒲震元 杜寒风

责任编辑：陈友军

封面设计：武晓强

出版发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010 - 65738557 65738538 **传 真：**010 - 65779405

网 址：<http://www.cbbip.com>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37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1085 - 017 - 2/B · 5

定 价：24.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印 装 错 误

负 责 调 换

序

世纪之交，为了推动我国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使之与广播艺术学、新闻学等学科形成良性互动，由北京广播学院广播文学系蒲震元教授、杜寒风副教授等筹划、组织，在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部设置了 2000 级博士生课程《美学前沿》，由杜寒风主持，邀请中华美学学会等部分专家学者主讲。这是全国高校非美学专业博士生首次开设美学课程，该课程面向北京广播学院各层次学生开放。

从 2000 年 9 月至 12 月，《美学前沿》课程共进行了十个专题的讲授，主讲人依讲课次序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杜书瀛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张法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王德胜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葛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聂振斌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孙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赵士林教授。《美学前沿》课程触及了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具有学科前沿的多向

度开放特色。作为全国高校首次把美学课程引进非美学专业博士生课堂，这门课程的开设对探索博士生教育改革和调整博士生知识结构，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中华美学学会通讯》2001年第1期、《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对《美学前沿》的开课情况进行了报道。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这本《美学前沿》论文集以《美学前沿》的课名命名，收入了课程主讲人的讲稿或相关论文，还有其他学者相关的美学研究文章。

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共同为我国的美学学术研究事业增砖添瓦。

蒲震元 杜寒风
2001年10月于北京广播学院

目 录

序 (1)

20世纪中国美学

- 中国文论和美学的百年轨迹 杜书瀛 (1)
百年美学的回顾与反思 聂振斌 (34)
20世纪中国美学图景及其学术史研究问题 王德胜 (56)
20世纪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与美学现代性 杜寒风 (76)
近五十年中国文学语言状况 王一川 (97)

美学原理

- 我的美学观 阎国忠 (119)
“美在关系”说的再探讨 童庆炳 (135)
日常行为与当代审美 苗 棟 (150)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反思 陶东风 (167)
论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感受的特性 张 政 (181)

中西美学史

合天人通道艺的文艺本体观

- 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之一 蒲震元 (189)
心学与美学论纲 周月亮 (247)
大篆之美 葛 路 (270)
日本美学前沿掠影 李心峰 (295)
卢卡奇的美学思想 李醒尘 (316)
本雅明的美学思想三题 张 法 (333)

试论基督教教堂与佛教寺庙的审美差异 吴 辉 (347)

文化批评与未来美学

人类新跃迁的美学意义和特征 孙 津 (355)

“全球化”：文化的视角 赵士林 (372)

中国后现代文化美学之批评 王岳川 (385)

大众化与美学的转型 丁俊杰 (413)

中国文论和美学的百年轨迹^①

杜书瀛

研究中国百年文论和美学，须把握住并且描画出百余年来文艺学和美学的运行轨迹，即这一百多年来文论和美学怎样由古典形态的学术范型转换为现代形态的学术范型，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和美学怎样生长、发展、变化，以及这中间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鸟瞰图

如果要写中国百年文论和美学的学术发展史，那么，根据这一百多年来文论和美学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分为四部，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它们也可以称为四部曲，每一部有它自己丰富和复杂的内容和相对于全书来说的分主题，而在每部的丰富内容中我们还可以分别找出其最突出的特点或“第一主题”。中国古代论诗讲

① 本文系据《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全书序论”改写而成。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共 4 部，140 万字，杜书瀛、钱竞主编，“全书序论”由杜书瀛撰写。

“诗眼”，论词讲“词眼”，论曲讲“曲眼”；现代导演说戏讲“戏核”。我所说的每一部最突出的特点或“第一主题”，就是它的“书眼”或“书核”。那么，这四部各自的“书核”或“书眼”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第一部：蓄势；第二部：蜕变；第三部：定格（或叫定型）；第四部：突破（或叫“反叛”）。

下面稍微作一点解释。

1. 蓄势

这是“史前史”，即百年文论和美学学术史的“史前”部分。这是“正史”之前的“序篇”。主要是讲文论和美学转换的“能量”是如何积蓄起来的。

为什么要从“史前”说起呢？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文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①为什么不以这“三百年”的开头为起点，而要追溯到宋？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果、互相联系着的。这“三百年”，汉学与宋学争得不可开交，倘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这样处理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我们治百年来的文艺学和美学学术史“何自始”呢？由钱穆得到启发，我们同样不能以这百年的开头为研究的起点。

某种社会历史事物，包括学术活动、学术运动，它的发生、发展都会有其很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根基，以及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起先，它可能在地下运行，或者在其他的掩体底下悄声悄气息地孳生；到了一定的时候，才钻出地表露出自身面目，或摆脱掩体而独立成形。百年中国文论和美学学术史，其由古典形态的学术范型向现代形态的学术范型转换、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有“看不见”的地下运行或在其他掩体中悄然孳生的阶段。它的受孕和胚胎形成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呱呱落地之前。这是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一个相当长的在娘胎里孕育的过程。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追述近代学术思想历程时曾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我思想界亦自滋一变也。”他认为，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的龚自珍、魏源是“新思想”（包括文论思想）“萌蘖”中值得注意的人物。的确，龚、魏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对传统文化（包括文论）作了某些批判性的反思，对“诗教”、“道统”之类持守千余年的文学原则提出质疑，期待“大变”^①。其实，百年中国文论和美学学术史的“看不见”的部分，还可上溯到龚、魏之前，明末清初某些新的学术因素的出现；还要更加注意龚、魏之后，特别是19世纪中、下叶，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睁开眼睛看世界”，传统文化遇到来自外部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挑战和来自内部觉醒者的怀疑、批判走向终结。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和美学正是从古典文论和美学的终结之中蜕变而生。古典文论和美学的终结，同时也是积蓄向现代文艺学和美学转换的能量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百年文论和美学学术史的第一部，它的特点（“书眼”或“书核”）用“蓄势”两个字概括。就是说，这一部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出在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之前，在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转换之前，这种转换的“势能”是如何积蓄起来的，中国文论和美学的内部如何在外力的冲击下造成了不得不变的趋势的。

这一长时段里已经逐渐积蓄起越来越强烈的“求变”势态和呼声，加紧做着变革的舆论准备：那些时刻关心着民族命运的志士仁人认识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

^① 参见《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第5章第2节第197—212页。

迁，风气无不移易”^①，“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②；他们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③，“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④。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⑤，而且，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还在思想观念及议会制度，倘观念和制度优越，则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⑥。他们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文明。例如，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留学生容闳，从1847年起在美国留学8年，中西对照，使他更加感到清王朝之黑暗腐败：“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⑦这样，经过长时期的积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变革势在必行。特别是“甲午”战败，更是一个强刺激，令人感到变革的刻不容缓。于是有“公车上书”，有“戊戌变法”，有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变革的先驱者们提出必须

①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5辑第3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10辑第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 魏源：《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 魏源：《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魏源集》上册第243页。

⑤ 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页。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9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⑦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88—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原为英文本，1909年在美国出版。

“破除旧习，更新大政”^①；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②；疾呼“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③

正是在中华民族不得不变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氛围之下，才不能不随之有文论“革命”，有新美学的萌生，或者说积蓄了文论和美学变革的巨大势能。

当然，文论和美学变革还有它自身的内在理路。

总之，用比较形象的话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论和美学的转换已经是“箭在弦上”了。那么，这“箭”是如何上弦的？这“弓”是如何拉开的？这个不得不发的将要射出去的弦上之“箭”是如何积蓄能量的？这就是第一部所要讲的最突出的内容。

2. 蜕变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至于20、30、40年代，才真正算得上我们现在所作的百年文论和美学学术史的正篇开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这时“蝉”才逐渐“蜕皮”、“出壳”，“蛹”才逐渐蜕变为“蝴蝶”，即中国现代文艺学才由“诗文评”的母体挣脱出来，发芽、生长、成型。所以，这一部总的特点我们用

^① 康有为：《公车上书》，《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第52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选集》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蜕变”两个字来概括。

“蜕变”期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两个高潮。

从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到 20 世纪最初十余年是第一阶段。这是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草创阶段，它刚从“蛹”中往外爬。或者说它正处在从传统文论（“诗文评”）和古典美学母体降生的过程中，脐带尚未咬断，还带着血迹；然而它的第一声啼哭是响亮有力的，露出无限生机。这也是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阶段，与传统的“诗文评”和古典美学相比，中国文论和美学已经从诸多方面发生明显变化。这时文论和美学的关注对象已经开始发生位移，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艺术的地位大大提高，小说的作用甚至被夸大到它自身难以承受的程度，在许多学者眼里，小说和戏剧等叙事文学已经取代诗文而成为文学的主角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的哲学基础和美学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西方的认识论哲学、进化论思想和某些美学理论已经引入，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或反映，有的学者还从真善美统一的角度对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界定；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以及范畴、概念、术语也逐渐表现出新的特点，理想、写实、悲剧、喜剧、主观、客观……，新名词越来越多。总之，学术范型已经不同于以前。这阶段的成就最突出、最充分地表现在小说理论的领域里。小说理论变革的先声，是 1897 年严复、夏曾佑发表于《国闻报》上的《本报附印说部缘起》^①。作者界说小说的性质是“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其事”，是“人心所构之史”；但“今日人心之构营，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不可“因其虚而薄之”。作者还从人性论的立场出发，提

^①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天津《国闻报》，当时未署名，梁启超《小说丛话》中说，“《本报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二人之手”。

出小说因描写“英雄”与“男女”这人类的两大“公性情”，才“易传行远”，可以“使民开化”。该文作为第一篇试图运用新观点论说小说的长文，实属可贵。但小说理论变革的主将、它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然非梁启超莫属。他在 1898 年《清议报》第一册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即推崇社会变革中“政治小说为功最高”，鼓吹“小说为国民之魂”。翌年，即 1899 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同时，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又三年，即 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在该文中不但把小说视为改革社会头等重要的手段；而且相当深入地探讨了小说的性质和特点，指出：小说能够“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而且能够把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故其“感人之深，莫此为甚”。同时，梁启超出色地论述了小说“熏”、“浸”、“刺”、“提”四种审美力量。此后，梁启超又同当时十余位著名学者联手写作了《小说丛话》发表于 1903—1904 年《新小说》第一、二卷^①，广泛论及小说的性质、作用、审美特点、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的评价、中西小说的对比等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现代文艺学草创阶段另一篇具有奠基意义的学术论文即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② 问世。该文借鉴叔本华的哲学、美学理论，评说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特别是拈出其悲剧意义予以重点阐发，这在中国文论史上旷古未有。写作《红楼梦评论》的王国维，可以说从观念、方法

^① 1906 年，《新小说》社又将《小说丛话》印成单行本，梁启超作序，说明该书写作缘由和经过。

^②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于 1904 年《教育世界》76—78 号、80—81 号。

到范畴、术语基本上都是“现代”的。此外，这十余年，还有数十篇论述小说的学术文章发表，比较重要的，如夏曾佑的《小说原理》^①，狄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②，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③，吴沃尧《〈月月小说〉序》^④，无名氏《〈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和《读新小说法》^⑤，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和《余之小说观》^⑥，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和《小说小话》^⑦，王仲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⑧，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⑨，黄世仲《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普及》^⑩，黄伯耀《小说与风俗之关系》^⑪，管达如《说小说》^⑫，吕思勉《小说丛话》^⑬，等等，它们大部分给梁启超以支持，但有的观点也与梁启超不同，而且不少文章对小说的特性分析得更加细密、深入、合理。除了小说理

① 夏曾佑：《小说原理》，发表于1903年《绣像小说》第3期。

② 狄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年《新小说》第7号。

③ 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1905年《新小说》第17号。

④ 吴沃尧《〈月月小说〉序》，发表于1906年《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

⑤ 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第1期和1907年第6—7期，发表时未署名。

⑥ 徐念慈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小说林》1907年第1期和1908年第9、10期。

⑦ 黄人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小说林》1907年第1期和1907—1908年第1、2、3、8、9期。

⑧ 王仲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发表于1907年《月月小说》第1年第9号和第11号。

⑨ 陶曾佑《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1907年《游戏世界》第10期。

⑩ 黄世仲：《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普及》发表于1907年《中外小说林》，第1年第11期。

⑪ 黄伯耀：《小说与风俗之关系》，发表于1908年《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5期。

⑫ 管达如：《说小说》，发表于1912年《小说月报》第3卷第5、第7—11号。

⑬ 吕思勉：《小说丛话》，发表于1914年《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3—8期。

论，这阶段的戏剧理论也颇令人注目。欧榘甲的《观戏记》、蒋智由的《中国之演剧界》、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齐宗康的《说戏》和《观剧建言》、姚华的《述旨》和《说戏剧》、刘师培的《原戏》、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陈独秀的《论戏曲》、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黄远生《新剧杂论》、冯叔鸾《啸虹轩剧谈》等等^①，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戏剧改良之必要、戏剧性质和特点，透露出戏剧理论的一些新观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如《中国之演剧界》）引入西方悲剧、喜剧观念论述戏剧的美学品格和社会作用，认为“悲剧者，能鼓励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而能使人学为伟大之人物者也”^②。这阶段的文论和诗论，像章炳麟的《序革命军》和《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夏曾佑的《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金松岑的《余之文学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总论》、刘师培的《论文杂记》、陶曾佑的《中国文学之概观》、周树人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柳亚子《寄胡尘诗序》、特别是王国维的《文学小言》、《人间词话》、《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与美术家之天职》、《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以及其他一系列文艺美学文章，表现出新的文论观念和美学气息，吸收和运用西方学术思想并与本民族的传统的文论思想相结合，观察和论述中国的文艺问题，为中国的文艺学研究开了新生面。尤其是他的《红楼梦评论》，在中国文论史和美学史上第一次阐发了《红楼梦》悲剧美学意义，强调《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典型的悲剧美。王

^① 以上有关文章，可参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蒋智由：《中国之演剧界》，《新民丛报》第3年第17期。

国维借鉴叔本华的理论，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以加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①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彻头彻尾之悲剧，是悲剧美的典范。同时，王国维还第一个主张在中国的大学里开美学课。他在 1906 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提出：“定美之标准与文学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学之一分科之美学中求之”^②，并建议中国文学科科目应设：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心理学、名学、美学、中国史、教育学和外国文。有人把王国维看作是中国现代美学之起点，是有道理的。

总之，梁启超的同志们和追随者，王国维以及所有那些倾向变革而又观点不尽相同的学者们，前后左右喧嚣鼓噪，探讨文学的本质、特征、作用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探讨诗、文、小说的“革命”以及它们的美学特征，掀起诗、文、小说革新和对之进行学术研究的不大不小的热潮。梁启超、王国维们所作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虽然可以找出某些偏颇之处，而且往往是新、旧交错；但他们的功绩是巨大的，可以说功德无量。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正是从梁启超、王国维们起，古典文论和美学开始发生质变。应该说他们是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开拓者和创立者。百年（20 世纪）文艺学和美学学术史正篇理应从他们讲起。

① 《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第 5 册第 50－60 页，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② 《王国维文集》第 3 卷第 72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